

开启重读马烽的新课题

段崇轩

双塔

王珊珊

逸闻隽语映风度

王珊珊

《世说新语》流传已有1500余年，翻书再读，不禁开始想，如果没有这本书，后世对于魏晋时代的想象是怎样。

有人临画，有人拓帖，画可摹其形，拓能仿其迹，但是创作本身以及它所承载的创造力性与时代情趣，却是无可替代的。“要想了解一件艺术品、一个艺术家、一群艺术家，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括。”(丹纳《艺术哲学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)《世说新语》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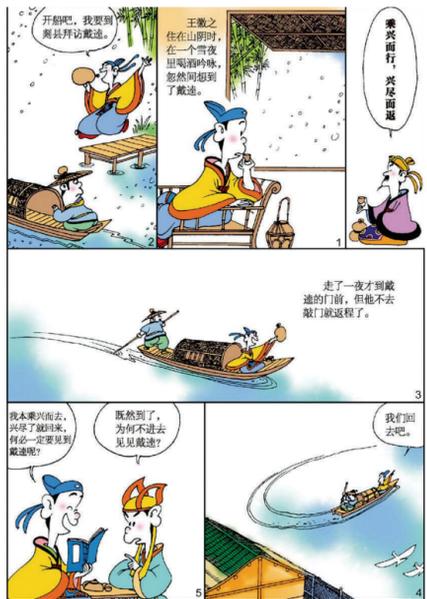
《世说新语》是古典笔记小说的经典之作，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编著，分3卷36个门类分别记述。鲜活呈现魏晋时期的社会风情与士人的心灵世界，构筑成一幅气韵生动的魏晋时代画卷。

文引为“纹”，《世说新语》以文法纹，借助文字重塑着魏晋风神，引得鲁迅评价其为“名士教科书”。这里的“纹”，既是魏晋士人举手投足间的神态风貌，“萧萧肃肃，爽朗清举”的嵇康，“眼烂烂如岩下电”的王戎等；也是那个时代丰盈独具的精神世界。陆云以“有千里莼羹，但未下盐豉耳”巧对羊酪之问，既见文人捷悟，又含地域文化的微妙碰撞；王徽之雪夜访戴安道，“造门不前而返”，是为“乘兴而来，兴尽而返”，将魏晋士人重过程轻结果的兴趣，重心轻外物的率真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极简的笔墨、深邃的思考，让人物的神采风流呼之欲出。相较于正史的宏大叙事，《世说新语》网罗的逸事细节如绒毛般纤细，让魏晋风神在读者的呼吸间翕动着。魏文帝曹丕参加王粲的葬礼，对友人提议：“王好鸣驴，可各作一声以送之。”这股越名教抒真情的行径，名士精神风度更加具象。它以纪实为底色，兼具独特的艺术魅力，将500多个人物的风神和时代的独特，通过简短的对话、不经意的举止、偶然的神情流露，栩栩保留。

都说魏晋是一个痛苦与觉醒并存的时代，它的这个特点是围绕在酒香中的。《世说新语》中的酒不是聚集宴饮的陪衬，而是精神的良药。昏然酒醉，何所不至？煎熬痛苦，醉酒寻我内心的慰藉和精神的放纵。“阮籍胸中垒块，故须酒浇之。”道尽魏晋名士的饮酒真谛。刘伶携酒乘车，命人“死便埋我”，妻子劝他于神前祝誓戒酒，“伶跪而祝曰：‘天生刘伶，以酒为名，一饮一斛，五斗解醒。’妇人之言，慎不可听！”便引酒进肉，慨然已醉矣，既是面对生命无常的旷达，也是对现实的反抗。“邻家少妇有美色，当护沽酒。籍尝诣饮，醉，便卧其侧。籍既不自嫌，其夫察之，亦不疑也”，阮籍是以醉酒打破礼制的虚伪，坚守内心的坦荡，一句“礼岂为我设邪”，言简却有振聋发聩的力量。他们身处政治黑暗、战乱频仍的年代，理想与现实剧烈冲突，朝不保夕，满腔愤懑。酒带给他们在痛苦中的坚守、在迷茫中求索的能量，也让魏晋风度有了这般的清冽且沉甸甸的精神重量。

如王蕴言：“酒，正使人人自远。”放达酒醉的外表之下，藏着最深沉的生命思考。若没有《世说新语》的细致描摹，后世或许只会将这份放达误解为耽于享乐。“兵家女有才色，未嫁而死。籍不识其父兄，径往哭之，尽哀而还。其外坦荡而内淳至，皆此类也”；阮籍葬母，“蒸一肥豚，饮酒二斗，然后临决，直言：‘穷矣！’都得一号，因吐血，废顿良久”；同宗族人饮酒，“时有群猪来饮，直接去上，便共饮之”，诸如此类记载，是以荒唐怪诞。但相较于动荡世态下的惺惺作态和礼制束缚，这份糊涂与自洽就变得尤其难得了。他们开始关注自我、发现自我、尊重自我，随顺自然，心境脱俗，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“人的觉醒”。

世上曾经发生过什么，我们未必知道得确切，但终会留下一些成为经典。无数文人墨客都从《世说新语》中感受魏晋风神，汲取精神养分。这一本书是魏晋名士风流玄思的映照，更承载起后世对魏晋时代的想象与向往。“山高水长，物象万千”，牵引我们共阅经典。



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 蔡志忠 绘

经典漫谈 (93)

的风雨变幻，为他们出谋划策。我把赵树理与马烽的身份都解析为“三位一体”，主体是“人民作家”，而基本身份是普通农民、农村工作者、知识分子。但二者三种身份的轻重、比例、组合又有所不同，形成了他们个性鲜明的创作面貌与风格。我力图打破主流话语对马烽的概括、定位，写出一个真实、独特的马烽形象来。但现在我意识到，我的思想观念不新，研究不全面不深入，对马烽的人生了解不够，发掘作品不多，研究方法不先进。我还要努力。

我们要寻找马烽及“山药蛋派”研究的学术生长点。研究、评论，要从地方走向全国，要从理念模式走向广阔的学术领域，要进一步发掘他们的史料、作品。就马烽的学术研究而言，还有很多新的课题有待去做。譬如马烽的家庭变迁、衰落对马烽的性格形成与创作内容的影响；马烽与新文学作家周文的关系研究；马烽与丁玲的关系研究。丁玲、周文都是重要的新文学作家，他们的思想、艺术观念对马烽一定有潜在的影响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很有意思、意义。譬如马烽思想、创作中的“五四”新文学因素，他读过很多“五四”新文学作品，是一位具有现代思想意识的作家，这些现代的东西怎样沉淀在他的思想和作品中，怎样转化成通俗化、大众化的因素。譬如马烽与乡村文学作家柳青、周立波、浩然等的比较研究；马烽那些揭示和批评冒进的，“左倾”的重要作品的研究，如《一篇特写》《四访孙玉厚》《“三年早知道”》等；后期作品如《玉龙村纪事》《袁九斤的故事》《结婚现场会》《葫芦沟今昔》《野庄见闻录》的研究；马烽散文、评论、电影文学的研究，等等。譬如马烽小说在世界各国的翻译、出版和评论的研究。这些课题都是新的、未曾研究过的，是马烽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。我建议山西文学评论界或山西广大学者，重读马烽，重读“山药蛋派”，一定会呈现出一种新的文学风景和学术境界。

论述马烽的生平、思想、作品方面，作出了丰富的建树。譬如刚出版的“马烽作品精选集”“马烽研究丛书”两种六本书籍，就是最新的成果。但是从更高的层面观察，我们的研究、评论还处在普及的、地域的水平和层面，还缺乏客观的、深入的、宏观的学术研究。我们的绝大多数评论还是围绕“表现时代变革”“为农民而写作”“践行大众化和通俗化道路”等展开。这是主流话语的高度概括，几十年来基本未变，不断重复。它是精准的、正确的，但也限制了我们对于马烽的新的解读、研究，把他和他的作品简单化、概念化了。对其他几位“山药蛋派”作家的研究也是如此。而赵树理研究则明显不同，虽然主流话语对他已有论定，但学术研究是自由的、全面的、丰富的。他成为一个研究热点，不断有文章发表、著作出版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实新颖、不断丰富的赵树理。我搜索了一下中国知网，在硕士、博士的学位论文中，赵树理有百篇左右；而马烽只有二篇，且局限在“农村书写”“民族化追求”两个主题上。马烽及“山药蛋派”研究，亟待走向客观、深入的学术研究，重现真实、丰富的“五老”作家面貌与形象。

作为山西的一名评论工作者，我研究马烽及“山药蛋派”也有半个世纪了，但投入的精力不够，成果也不多。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我发表的第一篇评论，就是《重评〈三年早知道〉》，发表在刚刚复刊的《山西大学学报》上。2004年出版了《马烽小说艺术论》，是“马烽研究丛书”中的一种。其中的五个章节作为独立文章，我曾投给多家刊物，得以发表，分别是：《马烽赵树理比较论》《马烽小说的民间底色》《“乌托邦”理想与现实的困惑》《马烽：三位一体的现实主义作家》《土色土香的农村史诗》。我把赵树理与马烽作了比较，区分了他们之间的相同与不同之处。我常常觉得赵树理像一位“农民领袖”，他立足广袤的土地，为农民鼓与呼。而马烽像一位农民中的“智者”，他就在农民中间，解说农村

她，不会站在原地等候我们

王宝国



作者介绍：王宝国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朔州市李林英雄文化研究会会长。已出版专著8部，长篇传记文学《东方贞德——华侨民族女英雄李林传》获2022—2024年度“赵树理文学奖”报告文学奖、第四届“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、第三届“中山杯”华侨华人文学奖。其他代表作有长篇报告文学《撑船记》等。

《东方贞德——华侨民族女英雄李林传》(以下简称《东方贞德》，中国华侨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)荣获2022—2024年度“赵树理文学奖”，我感谢奖项主办者和评委们，也感谢我的传主李林。

抗日战争前夕，南洋侨女李林毅然来晋，先在太原参加军训，七七事变后奔赴“前线的前线”大同，后转至晋绥边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，主动出战，威震晋绥。1940年4月26日，李林壮烈牺牲于今朔州市。

我是李林牺牲地的作者。自2005年4月7日起，我研究、记述李林，已走过20余年历程，先后出版李林传记5版，其他关于李林的读本二部。为海内外报刊、研究机构提供李林叙事50余万字。十几年来，我应邀赴京、港、闽、晋、蒙等地开展李林主题讲座、报告101场。

《东方贞德》是我的第五版李林传记，于2024年列为李林母校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校本教材。

“她，不会站在原地等候我们。”美国作家玛丽·戈登研究法国民族女英雄贞德之感慨，说的是宣扬英雄精神没有结束的时候。这恰好讲出了我研究李林执着到底的缘故和心声。

我的李林研究之路，20年追寻，20年自费。自费购置资料千余份，自费赴晋、蒙、闽、沪、浙等地的16个县(市、区)进行田野调查，还自费成立一所专业的李林研究机构——朔州市李林英雄文化研究会，以个人行为服务全社会。

那么，我研究、记述李林的理路如何呢？中国英雄，背景层层。英雄与民族、英雄与政治、英雄与民众、英雄与社会之多重关系隐藏着英雄的命运逻辑，我做的探寻真相、揭开矛盾的研究型叙事。《东方贞德》记述

是呀，饱含生命之光的痕迹/清晰可见”，诗人的这句喟叹交织着喜悦与敬畏。由此看来，黄益淡的诗歌视角擅长着眼于细微，积力在低处。他的作品，流露着一种天然的亲近，也散发出自在的柔和，仿佛他诗中所诉说的一切，也都在你的眼前、耳边、身旁。就书写角度这一点，黄益淡很是值得称赞。

我见过太多诗人或者作家，常常将书本中、网络中得来的虚拟“次现实”，一次次拿来贩卖和勾兑；而对生活这个“第一现实”的探索，却从缺乏耐心与兴趣。显然，黄益淡拒绝去充当一个唯心、唯美的看客、师爷、秀才。他热气腾腾活在一个，与周遭那些贩夫走卒、妇孺老少共同感受着悲喜，体会着炎凉，进而将这些司空见惯与普罗万象的人、事、物，不断提纯、打磨、淬火，使之渐渐显露出锋芒，然后凝结为珠玉般的诗行。毫无疑问，在黄益淡的写作谱系里，他永远是那个身临其境的在场者，更是一个同甘共苦的话事人。《祭扫时》，就是这样一首在场和话事之作。从表面看，这首诗是第三人称视角，事实上作者却深度参与“她”的生命体验，并作为两个“她”之间的纽带，牵连着生与死、爱与心碎之间。“太阳升起时/祭扫刚好结束/她并不急着把照片/送回寄放处/一个人紧紧地/抱着相框/朝着阳光/站立了很久/世上只有一件事/让她心碎:/在她的记忆里/她从来没有/像现在这样/抱过她/尽管，她们彼此/深爱着。”从

我们这些点灯人

马三寒

“茶点快准备好了，太阳已经西落；这时候，可以在窗口见到李利走过身边；每晚，吃茶点的时候，你还没就座，李利拿着提灯和梯子来了，把街灯点亮。”“只要门前有街灯，我们就很幸福，李利点亮了许多盏，又点亮了一盏在我家门口。”这是英国作家斯蒂文森的儿童诗《点灯的人》中的句子。读这首诗的时候，我觉得李利就是我们——辛勤的语文教师们。

任何一篇课文，在学生面前都是一片黑夜，即使他们预习了，朗读了，好像读懂了，自以为朝霞满天的清晨已经到来了，但是，黑暗依然存在。就像《小英雄雨来》这篇课文，多年来，一直被语文教材选用，我念小学的时候，就认识了这位小英雄。这种故事性较强的文章，孩子们似乎一读就懂。可是，他们究竟懂了什么了呢？他们懂了每个汉字应该怎么读，懂了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，懂了语文参考书上的标准答案，这还远远不够。每一位语文教师都应该是一位智者，用智慧的火花点亮文本的明灯。

有位学生向我诉苦，语文老师让他们在课堂上把《小英雄雨来》朗读三遍，要把他们累死了。也许这位语文老师是为了体现那句古训“书读百遍，其义自见”，也许是为了贯彻新课标的要求，培养学生自读自学能力，可是无论怎样，只要学生觉得快要累死了，这堂语文课就已经失败了。只有在黑暗中枯燥而又茫然地赶路，孩子们才会感到异常疲劳。如果让他们观赏着风景前行，他们定会乐此不疲。

我也曾觉得《小英雄雨来》这篇老课文没什么好讲的，但是，我不甘心在名篇面前失语。我在文本中搜寻突破口。当我发现描写雨来的几个动词在熠熠发光的时候，我仿佛变成了成功突围的勇士，看到了生命的希望。于是，在黑暗中，我点亮了一盏明灯。就像那首诗中写的一样：“只要门前有街灯，我们就很幸福。”学生在我的引领下，感受到了发现的惊喜、阅读的幸福，以及创作的满足。

语文教师需要辛勤，但更需要智慧。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：“教育不是要人消极接受，而是要激发主动性，培养独立性，最终帮助学生获得自我塑造、自我完善的目的。”我们这些点灯的人，就是要引领学生在文本中擦出智慧的火花，让一盏盏明灯启迪他们的学习主动性。

逆光与追光

张二棍

在水西大街与桃园北路的交叉口，有个新视觉眼镜店。老板是温州人，从少年时便来到太原，自此开始了配镜生涯。老板面容清秀，待人和蔼，被一众新老客户亲切地呼喊为“小黄”。几乎和配眼镜同时开始的，还有一件不太为人知的事儿，那就是他持续了近30年的诗歌写作。

没错，黄益淡开了多年的眼镜店，也写了多年诗歌。恍惚的时光，早已把一个“温州小黄”，硬生生改造成了“山西老黄”，可他依然顶着“小黄”这样一个调皮又生动的称谓，书写着那一寸寸确凿而沉闷的光阴。黄益淡的诗，正如他的微信昵称“小黄眼镜”，永远观望着、打量着、书写着他身处的生活现场。也可以说，他用一首首热气腾腾近乎《诗经》中“风”的书写，拒绝诗人“书斋化”“网络化”“哲学化”“知识分子化”的命运。

黄益淡先生恪守着古人在日常中“采风”，于平淡里“写史”的传统。他以赤子般真切的情感，置身在那无比饱满也无比庞杂的现实之中，用略显感伤的暗哑腔调，对自己耳闻目睹的点滴过往，娓娓叙述出“且慢”与“拜托”的种种愿景。比如《痕迹》，黄益淡用短促的篇幅，写尽了时光消逝、人事更迭的感怀。“……我紧紧抱住，久久看着/粉红色的面庞、灿烂而又稚嫩的笑容……”当一个曾经是怀抱中的孩童，已经成为小心翼翼的母，当这个母亲将自己的孩子轻轻送到诗人的怀抱之中，“好像时光在我怀里原封未动/但